

# 西方经济学的新领域

## ——经济分析方法在非经济领域的应用

文建东

目前西方经济学的最大进展之一就是它在非经济领域的广泛应用,过去三十多年里,经济分析方法在西方经济学界被广泛运用于分析各种非经济性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研究以前属于其它学科的内容;这为经济学的发展拓展了全新的领域,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经济方法何以能分析又如何分析非经济问题,这种分析表现在哪些领域又取得哪些进展,其意义何在,缺陷是什么,这些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经济分析方法之所以能研究非经济问题,原因在于:一切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的非经济方面仍然包含着深刻的经济内涵;因而个人与团体其实是依据成本——收益比较分析来指导和决定自己的行动的,而且非经济活动中的人也象经济学所假定的那样是理性的。

经济方法在非经济领域的应用涉及到经济学研究对象或定义问题。确切的经济学定义在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广泛的争论,但广义地讲,说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和社会的经济行为、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总之是经济问题,大概一切经济学家都没有任何疑议。关键在于,对经济问题的具体内涵即经济学的具体研究对象,不同的学者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辞的。在所谓传统经济学(古典与新古典)看来,经济问题就是利用一定的稀缺经济资源通过生产和交换来实现个人物质利益的目的问题,所以经济学要研究的就是生产、消费以及连结二者的流通和交换。这是他们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限定,因为这一限定,在传统经济理论里是看不到对非经济问题的研究的。但实际上经济问题范畴绝不如此狭窄。考虑到人类一切活动都不过是用各种方法利用一定资源实现不同的目的,只是这里的方法不一定是生产和消费,资源不一定只是经济资源,目的不一定只是物质利益,考虑到这些就可以说,广义地讲,一切非经济问题都包含着深刻的经济内涵,可以看成是经济问题的间接表现形式。例如养育孩子要支付费用,也能获取乐趣;大多数犯罪无非是希望用非法的手段牟取暴利或获得某种心理满足;接受教育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精力和钱财,取得文凭,以便日后有一个好工作从而得到高而稳定的收入;即使是恋爱与婚姻也考虑进了对方的经济状况与日后的生活水平;教堂的宗教活动有供给和需求,要付出成本,但也能获得满足,如此等等。这些活动除了不是直接用货币通过交换进行而外,和生产活动、消费活动几乎没有两样,完全可看成是间接的经济活动。因此,非经济活动不过是经济活动在非经济领域的延伸。总的来说,“从理性的或科学的观点看,所有现实的实际问题都属于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生活问题就是‘经济地’利用资源,让这些资源尽可能多地产生合意的结果,因而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完全就是生活原理。”<sup>①</sup>因此,被古典经济学排除在外的的问题也应该纳入经济学体系,用经济分析方法加以补充研究。

非经济问题不仅应该而且也可以用经济分析方法加以补充研究,这就在于,既然社会中的人与经济中的人一样是利用一定的资源达到一定的目的的,那么,他们也一样会依据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决定自己的非经济行为和活动。事实也正是如此。例如,功课不好的学生,考试是否作弊,就要权衡成功后的喜悦和失败后的严重后果;官员是否受贿,既要考虑收受贿赂带给他的巨大物质利益——这是所谓收益,同时也要考虑接受贿赂后要交出某种特权、承受心理压力和负担风险——这构成了成本;老年人的保守是因

为他们对自已的未来价值看得很低而不愿冒险丧失既得利益，而青年人的激进是因为还没有既得利益可丢失从而认为自己有无限广阔的前景。这都说明，人们无论在经济活动还是非经济活动中都在依照成本——收益分析进行决策，所不同的是，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收益是物质的，可用货币衡量，而在非经济活动中它们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如信念、良心、荣誉、名节等各种心理状态方面的得失，并且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地点，对成本与收益评价不一样。既然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是以成本——收益分析为基础的，这种分析方法就完全可以用于研究非经济问题。

人们在行动和决策中要考虑成本——收益这一事实表明，人们在非经济活动中与在经济活动中一样是理性的，符合经济学所假定的理性原则。我们知道，经济学认为人是利己主义的，追求个人利益与个人欲望的实现，但由于欲望是无限的而满足欲望的资源是稀缺的，为了用有限的资源更好地满足无限的欲望，就必须合理选择资源的各种配置方式，比较其成本与收益，力争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这就是所谓理性原则，是经济学的出发点。例如生产者希望通过生产付出一定成本得到最大收益，而消费者则力求花费一定收入从消费中得到最大效用。事实上人们在非经济活动中也是这样的。社会的人同经济的人一样，也是追求个人利益的。例如捐款给穷人，这种行为能带给他某种满足，满足他的同情心和帮助他人的欲望。因此关心他人的种种举动只不过是出于满足他不同形式的欲望的动机包括各种精神追求和心理满足如宗教信仰、思想信念、侠义心肠、价值观念以及同情心、成就感、权力欲等等。实现这些个人利益需要利用各种资源付出一定成本，这些资源既包括经济资源也包括个人的时间、精力、才智以及承受各种心理压力的能力，从而成本也就包括货币支出和导致的各种心理压力、精神代价。既然如此，人们在非经济活动中同样要考虑成本与收益、付出与获取，大多数人在大多数场合都要进行计算，利用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努力实现他所希望的任何目标，力求以一定的付出或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或满足。这就是说，人们在一切活动中都是理性的，只是这里的理性行为与经济活动中的理性行为相比，含义更为一般内容更为广泛。既然理性原则是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就完全可以用于分析非经济问题。

综上所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应局限于物质产品和欲望，或不应局限于用货币进行交换的商品市场。”<sup>②</sup>

## 二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西方一些经济学家把具有各种属性的人都看成是理性的人，纳入经济学体系，用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其非经济活动，其中应用最多的就是以成本——收益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均衡分析，也就是微观经济分析，只是其内涵有所扩充。

这里所谓“理性的人是指这样的人，他们既有意图又合乎逻辑地行事，有非常明确的目的，只受希望尽可能实现这些目的的愿望驱使，具有做到这些所要求的计算能力。”<sup>③</sup>非经济活动则是指做一件事或获取一件东西，它也包括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这两方面都是要付出成本也能获得收益的，并且存在着边际成本递增和边际收益递减。由于非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理性的，一项活动的成本与收益就决定了其供给与需求。为了最大利益，人们会按照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提供各种活动，由于边际成本的递增，非经济活动的供给就必须随着边际收益的提高而增加，同样个人在需求这项活动时也要追求最大利益，会把其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分配到各项活动中，按照各项活动所用资源的边际收益都相等，即各项活动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之比都相等的原则确定各项活动的需求，由于边际收益的递减，需求随着边际成本的下降而增加。至于某项活动究竟是多少就取决于其供求状况，当供求相等时，就产生了该项活动的实际量，即均衡的活动量。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任何一项非经济活动都包含着需求与供给、成本与收益诸方面，成本限制着该项活动，收益则鼓励了它，因而任何一项非经济活动或行为最终都是由其成本与收益共同决定的，取决于两者的对比。而且非经济活动同样符合供给定理、需求定理和供求定理。

这就是研究非经济问题的经济分析结构。但要注意的是，经济分析的目的不是对现象加以简单描述，而是要对其内在因果关系进行深入探讨，说明人们何以有那样行为，预期他们将会如何行事。总之，经

济学研究方法提供了一种运用于一切人类行为的结构——即运用于各种决策类型和从生活方式到人格品性的结构。这样，就完全可以吧社会现象、个人活动和人类行为的一切非经济方面都纳入到上述结构之中，纳入到微观经济分析体系之中。

### 三

经济学传统边界的突破，起始于本世纪50年代中晚期，主要来自美国经济学家。在以前属于其它学科各领域，现在应用了经济分析，并取得一定成就，形成新的经济理论。

经济分析在非经济领域较早较成功的应用是加里·贝克尔和西奥多·舒尔茨等人用它分析人力资本和教育。贝克尔等人认为，人力资本主要通过对人的投资如接受教育、进行保健支出等形成，因而要付出一定成本；而人力投资的目的是改善未来货币收入水平和心理状况，因而又有收益。所以决定人力投资的唯一因素就是其获利性，即预期收益的现值与成本的比较。舒尔茨则强调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人力投资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接受正规大学教育，其教学质量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受到收费标准的影响，可通过接受社会资助和政府补贴来降低收费标准而提高教学质量，因为收费低使生源（教育需求）超过受教育机会（教育供给），一方面在学生中形成竞争和压力，另一方面由于收费远低于成本或均衡收费，学校与教师可不必考虑学生愿望而提高教学标准和严格要求，以此作为对实际收费（价格）与均衡收费（价格）差额的补偿。相反，由于大学数量猛增而生源不变就引起教学质量下降。他们还认为，如果实现不当的学生评估制度就会引起分数膨胀和贬值，因为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既根据其教学能力与质量，也根据其对学生的要求与标准，因而教师为了得到一个好评是不会吝惜分数的。

贝克尔等人还对本属社会学课题的婚姻与家庭进行了经济分析，得出与传统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婚姻也有市场，奉行自愿交换和自由竞争的原则，其目的是得自家庭的满足，同时也要付出一定代价如要丧失单身或与他人结婚的乐趣。只要一个人预期得自婚姻的收益会超过其成本时就会结婚，并由于上述原则而最终出现符合帕累托最优的婚配。他还认为，这种婚姻特点是同等级匹配，即资源相当的人结合在一起，否则就出现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在他看来，由于信息不完全，婚姻也就不稳定，因而配偶不一定最理想，婚后加深了解后得知收益小于成本的一方会感到不满，会要求对方作出补偿，或者是货币上的让步如嫁妆的增减，或者是行为上的允诺如戒烟与否；如果还是不满，就会离婚而致家庭解体。婚后双方实际状况的改变也会导致这种结果。贝克尔接着分析了婚后家庭行为，认为家庭中都是按照相对优势进行家务分工的，因而一般是男方出外工作而女方操持家务，但他也指出，最近男女同工同酬运动致使许多妇女离开家门走向市场，家务分工出现重新组合。家庭活动之一是生育，生育在贝克尔看来是因为父母能从孩子身上得到某种满足，从而愿意在他（她）身上花费货币、时间与精力。于是孩子就被贝克尔看成是一个耐用消费品，其多少取决于其带给父母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生育率即由此决定。这就解释了，发达国家出生率下降的原因在于，已婚妇女就业率上升和父母工资增加致使养孩子的机会成本（时间价值）提高。诚然，家庭也不全是因为经济利益才结合，贝克尔承认其中有爱的基础和利他主义行为，但在他看来，利他主义实际上是把对方的享受看成是自己的满足，因而仍然可以归结为利己主义，可以用经济方法加以分析。

在法律与犯罪行为方面也应用到了经济分析方法。一些经济学家分析了法律存在的经济基础，认为法律是降低犯罪率成本最低、收效最高的途径。这是因为，虽然通过私人防范、社会法治教育和执法机构的打击惩罚都可制止犯罪，但由于边际成本递增和边际收益递减，单依靠其中一种则成本太高，同时警察机构的集体防范与惩罚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因此如果同时利用这三者就会节省较大一部分私人防范开支，而只需增加较少的警察法院成本。这就是法律与法治存在的经济基础。同时他们也认为，不可能指望把犯罪率降低到零，因为那要花费太多的资源、付出太高的代价，从经济观点看，只应把犯罪率降低到其减少量的边际收益现值恰好等于其边际成本现值时为止。他们也分析了犯罪活动的经济根源，并把犯罪分子看成是理性的人，其活动取决于成本与收益的对比、供给与需求的相等；从而加重惩罚能减少犯罪活动，而犯罪所获赃物的增加则促进了更多的犯罪活动。

经济分析在非经济领域最富有成果的分析，还数詹姆士·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等人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在他们看来，政治和经济是一个相互联结的过程，政治活动犹如一个市场，参与者都是利己主义的，例如选民总是希望获得的公共产品多一些而纳税少一些，因而选给自己代言的人，而政客则追求自己的地位、权力与物质享受，希望扩大本部门的规模与行政预算，当然也要受到选民的约束而不得不考虑其愿望。但由于现代民主制度的缺陷，选民的愿望和社会利益总受到抑制。例如公共活动经费来源的分散性和利益分配的集中性，致使扩大开支带给人们的费用很微小而带给少数人的利益很明显，这少数人就能组成比多数人更强的集团，支持政府扩大开支；再加上信息的不完全，政府部门的内在扩张冲动就难以遏制；同时由于缺乏竞争而使政府效率低下产生官僚主义。这违背了选民意愿，损害了社会利益。因而他们主张重建民主制度。这就是近来颇有影响的公共选择理论。

除上面提到的外，经济学还被广泛应用到了歧视、欺蒙、自杀、吸毒、赶时髦、宗教信仰、习俗与传统、老年人的保守与青年人的激进等各种本应属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非经济性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甚至应用到了生物学领域。这方面的成就大都是与加里·贝克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 四

经济理论与方法在非经济领域的应用只有30多年的历史，但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表现在，第一，形成了众多的新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如人力资本理论、教育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家庭与婚姻经济学、犯罪经济学以及社会相互作用论等等，这些学科已日臻完善，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这种推广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这可从领导这一潮流的经济学家在西方经济学的地位看到。例如西奥多·舒尔茨因人力资本分析、詹姆士·布坎南因公共选择理论而分别荣获1980和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82年获诺贝尔奖的乔治·斯蒂格勒也探讨过政治行为和信息问题；加里·贝克尔则是把经济分析推广到普遍人类行为的集大成者，并因此而被视为最年轻有为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他还曾长期领导美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

经济分析方法的推广应用，其意义也是深远的，这不仅是对经济学自身而言，对其它学科、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的方式而言都是如此。对经济学而言，经济分析方法的推广应用打破了其传统疆界，丰富了其内容，推动了其发展，这标志着西方“经济学已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物质资料象，的生产和消费结构，仅此而已（即传统市场学）。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即研究货币交换的关系。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扩大到研究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经济学要研究的是问题的本质，而不是问题是否具有商业性或物质性。因此，凡是在以相互对立的为目的为特征的资源稀缺情况下提出的资源配置和选择问题，都属于经济学范畴，均可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研究。”<sup>④</sup>意义还远不止于此。由于任一学科都有其特定的对象特定的方法，都是对社会现象或人类行为的某一方面加以研究，而事实上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都是相互关联的，特别是都和经济因素有关，因而单学科的研究是不全面的，引进经济分析方法弥补了这一不足，起了相互补充的作用。正因为如此，经济分析头脑使我们对各种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有了一个全新的甚至是与以前截然相反的看法，例如，我们知道了大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何在，知道了犯罪率何以不能完全消除，知道了生育率如何降低。这同时也给我们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找到了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对于想消除的现象，如犯罪和人口过剩，可想办法增加其代价减少其收益；对于要鼓励的事物，则尽力增加其收益减少其成本，如可通过降低个人教育费用、改善知识分子待遇来鼓励人们进行人力投资。正如法国学者亨利·勒帕日所说，应用经济方法分析非经济问题的“美国经济学家的著作不仅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完善和简单补遗，而且是一场真正的思想和科学革命，它对我们目前理解社会的方式提出了全面的否定。”<sup>⑤</sup>

但是，西方经济学在应用经济方法分析非经济问题时也显露了致命的弱点。其一是，这种分析以理性原则为前提，理性原则假定人们始终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正确判断成本与收益等等。而事实表明，人并不都是也不总是理性的，因为它有原始冲动，有潜意识行为，有时受情感而不是大脑的指挥，有时因劳累、分心、愤怒、愚蠢而丧失计算判断能力，有时因信息不完全而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其成本与收益是

多少。因此人们难以经常做到行为最优化，例如我们买东西时总是上当受骗或后悔遗憾，再如两人因小事而争气斗狠。所以经济方法以理性原则为前提，就不能很好解释上述非理性行为。其二是，这种分析以成本—收益比较为基本方法，成本—收益比较要求能确切计算活动中招致的各项成本和得到的种种收益，但在非经济活动中，收益—成本被广义化为得一失，而得一失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物质方面的得失可确切计算，但精神方面的得失则基本上取决于主观心理评价，既难于确切计算，又缺乏统一标准。因此，成本—收益比较难以胜任对非经济活动的分析，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强行把人类活动的精神方面物质化而纳入成本—收益体系中，就犯了主观唯心主义错误，既不能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更难以对人类行为的变化进行有效的预测。其三是，这种分析假定人们总是利己与自私的，西方经济学在这一点上犯了根本错误。一方面，人的自私本性与利己主义只是一个历史概念，在私有制社会固然是如此，但在公有制社会里人们的精神面貌则有了根本转变，出现了很多大公无私的现象，而西方经济学则狭隘地把自私与利己永恒化了。另一方面，即使在西方，自私与利己也只是人们行为的一个方面，各阶层尤其是无产阶级还有着无私的奉献、高尚的爱心、以及美好的精神追求与向往，尽管有些属于资产阶级伦理道德范畴，但毕竟不全是利己与自私。在这一点上西方经济学又把利己与自私绝对化了。西方经济学也意识到这诸多例外，从而重新解释了利己与自私，但这种解释却太过牵强。因此，经济方法只能部分地解释部分非经济现象和行为，只能说，经济方法“分析人们行为的科学洞察力在一定程度上是杰出的，这与其说是因为它们作为有用知识在某一绝对级别方面排在很前，不如说是因为它们道出了一些没有它们我们就不能知道的事情。总之应让这些洞察力总处于发展中，它们多半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而只是表述了我们目前理解世界所尝试的一种方法。”⑥为了更全面地理解人类行为，我们还必须借助于其它社会科学。

#### 注释：

①弗朗克·奈特：《经济学科学方法的局限》，载《竞争伦理学及其它论文集》，哈泼和罗出版公司，1935年版，第105页。②贝克尔：《家庭经济分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③罗伯特·J·奥曼：《对策论试图做到什么》载肯尼思·阿罗等：《经济学尖端》，巴塞尔·布莱克威尔公司，1985年版，第35页。④贝克尔：《用经济方法探讨人类行为》，转引自《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第6—7页。⑤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页。⑥戈登·图洛克和理查德·麦肯齐：《经济学的新世界》，理查德·D·欧文公司，1985年版，第23页。

(责任编辑 曾德国)

#### (上接第7页)

在我国实际计划工作中，制订多种备择方案，已受到重视并广为应用。一些部门甚至规定，在没有备择方案的情况下不进行决策。

了解国内外经济计划工作的趋势，借鉴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无疑有助于提高计划工作的质量，使计划工作更有成效，使计划更具有科学性。这对于促进我国的经济改革，对于当前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探索，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 注释：

①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人民日报》，1991年4月16日。

②杨方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讲话》，中国金融出版社，第5页。

④⑤(美)刘易斯：《发展计划》，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1、144页。

⑥(美)劳伦斯·克莱因、理查德·扬著：《经济计量预测与预测模型入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47页。

⑦参见瓦西里·列昂节夫著：《经济论文》，交易图书公司，1985年版，第398—406页。

(责任编辑 徐云鹏)